

德国：由主权统一到内部统一

王志强 戴启秀

摘 要:1990年10月德国结束了占领国对其主权的限制,实现了主权统一;近14年来,德国政府致力于内部统一、实现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制度一体化。德国内部统一虽是一个内政问题,但这也受制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外部因素。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冲击必然影响主权国家对本国公民利益的保护。德国的改革历程显示了在产品、资本、劳动力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局限性。

关键词:主权统一; 内部统一; 经济全球化; 经济主权

作者简介:上海外国语大学 德语系 博士 副教授 上海 200083;
上海外国语大学 社科院 副研究员 上海 200083

中图分类号:D730.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04)01-0014-06

二战结束,德国作为主权国家名存实亡。德国被占领国分割成四个占领区,前帝国首都柏林也分别由四占领国共同管辖。因占领国对战争赔款问题的不同处理方式和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战后德国逐渐走向分裂。1947年1月英美占领国决定在经济上将其占领区合并成双占区,随后法占区也介入成为三占区。在此期间西占区实施的货币改革为西占区在经济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但这也为德国分裂埋下了伏笔。为抵挡前苏联势力向西推进,美英法最终同意西占区成为独立国家。1949年5月23日,随着《基本法》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宣告

成立;同时生效的美英法“占领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又限制了联邦德国的国家主权。西占区成为独立国家加快了东占区的国家建立进程,1949年10月7日在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由此德国开始了长达40年的分裂历史。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按照“基本法”第23条加入了联邦德国,两德分裂历史由此结束。德国的统一也最终结束了二战以来占领国对德国的主权限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在统一后的近14年,德国致力于内部统一,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一体化,但这些行动努力未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短期内完成,东

西德百姓们仍然存在一堵“心理墙”，面对东部地区高失业率和由此所致的社会问题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德国要最终实现内部统一将是一个较长过程，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①

下文试图从国家分裂到主权统一，统一后努力实现内部统一及面临的挑战等方面，对德国统一这一发展进程作一论述。

一、由国家分裂到主权统一²

在长达40年的两德分裂中，面对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各届政府经历了由不承认到承认德国现状和在东欧剧变背景下完成德国主权统一这几个阶段。

1、面向西方和“哈尔斯泰因主义”

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面对国家分裂和主权受到限制的现状，阿登纳政府便制定了重返西方、重新武装和重建家园的国家原则，并根据国家至上原则制定了四项任务：恢复国家主权，融入欧洲，在世界体系中维护自我形象和最终消除国家分裂。在这一国家基本原则框架下，阿登纳成功地逐渐从西方占领国那儿为联邦德国获得了国家主权和在“自由国家”中的平等权利；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大部分针对联邦德国的主权限制也随之取消，只是在德国最后统一问题上占领国仍保留最后决定权。1958年欧共体成立为联邦政府提供更大的机会和空间，在更大范围内赢得伙伴国的尊重；加入北约后，联邦德国便开始重新武装，建立联邦国防军，在维护国家自我形象方面取得了较快的进展。在德国统一方面，虽然消除国家分裂是阿登纳政府确定的四项基本工作之一，但没有进展，来自前苏联方面的两德统一建议也遭到了阿登纳的拒绝。

在阿登纳长达14年的执政中，德国统一没有进展，这同阿登纳政府制定的针对民主德国的“哈尔斯泰因主义”基本政策有着内在联系。因为，“哈尔斯泰因主义”（Hallsteindoktrin）将联邦德国看作是唯一的原德国继承国，其政府代表全体德意志人民。在这一政策下，联邦政府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取了“不承认、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并通过不与已承认民主德国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方式，达到在国际上孤立民德的目的，在很长时间内，这种强

硬、不灵活外交政策左右阿登纳对民主德国的政策。

在此期间，东西德边界亦由开放状态转向封闭。民主德国方面虽然通过了禁止东德百姓过境前往柏林和西部地区的“边界法”，但在1961年前，柏林边界仍处在开放状态，许多东德百姓借道西柏林进入联邦德国，至1961年柏林墙竖起前，有近占东德人口18%的300万人逃往西德，其中绝大多数为东德社会精英，如医生、教授、工程师和一些政府官员等。为阻止如此严重的社会精英流失和保障东德社会和经济的稳定，1961年8月13日凌晨，东德政府在东西柏林交界处突然筑起柏林墙，切断通往西柏林的所有通道，一夜间东西柏林被分割成二个地区，从此，两地德国百姓开始了长达30年之久的分离命运。柏林墙切断了东德百姓前往西柏林和西德的最后途径，中断了东西德人员的交往。虽然东德方面允许西德公民通过柏林墙，到东柏林作短暂探亲，但东德百姓不能前往西柏林和西德地区，1964年起东德边界逐步开始对退休人员开放。对联邦德国来说，柏林墙的建立使东西德边界由开放转向全封闭，德国统一前景再度渺茫，而阿登纳对民德的“三不政策”也加剧了两德的对立。另外，阿登纳对东德的政策及东西德分裂现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二战后所形成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产物。

2、“通过接近求变化”——新东方政策

1969年社民党赢得大选后，勃兰特政府便废除了前政府以“三不政策”为核心的“哈尔斯泰因主义”，提出了“通过接近求变化”的新东方政策，承认德国现状，要求放弃使用武力，与东欧国家签约建交，承认奥得河边界，裁减美苏在两德的驻军，使之达到均衡，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在这一新外交政策框架下，联邦德国将外交政策视角和重心由西欧逐渐转向东欧和前苏联。这一重心转移为改善东欧国家关系和两德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益的前提。

在新东方政策背景下，1970年8月勃兰特总理访问苏联，签订了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意在处理两国争端时互不动武，承认欧洲现状——奥得河/尼斯河德波边界。此条约为联邦德国同其它东欧国家改善关系奠定了基础。在访问前苏联后，勃兰特

^① 《Handelsblatt》，2001-09-24，S. 1.

访问了波兰,双方签订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突然双膝下跪之举在德国国内、欧洲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勃兰特勇于面对历史的谢罪举动不仅化解了德国和波兰两个相邻民族的战争夙怨,而且也在全世界面前表明德意志民族对战争行为的忏悔和自责。因其和解之举和“新东方政策”,勃兰特在1971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同年,美英法苏签订了“四国柏林协定”,重申柏林不属于联邦德国,但联邦德国有权代表西柏林。

面对民主德国,勃兰特政府放弃过去的“三不政策”,采取积极接触政策,1970年3月实现了两德首脑在东德埃尔福特市的首次历史性会晤;1971年12月两德签署了“过境交通协定”,以此确保西柏林同联邦德国交通的畅通无阻。此外还签订了扩大两德贸易和方便东西德公民探亲等协定。1972年两德签订了确定两德关系的“基础条约”,双方相互承认,但互不视为外国。在各自首都设立“代办处”,而不设使领馆,以此为内容的两德基础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使紧张的两德关系得到缓和,但国家的分裂也由条约形式得到了确认。

勃兰特“通过接近求变化”的新东方政策一方面促进了两德的接近,缓解了冷战所致的两德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又为德国以后的统一创造了重要的外部条件。

3、东欧剧变和德国最终统一

1989年东欧剧变为德国统一带来历史性的机遇。在东德建国40周年之际,在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的影响下,民德各地出现了要求言论自由、旅行自由的示威游行,“莱比锡星期一游行”很快遍及民德各地。在此期间,匈牙利在1989年5月首先开放了通往奥地利的边界,为封闭的华沙公约组织边界打开了通往西方的通道。波恩政府同布拉格政府就东德公民滞留西德驻布拉格使馆事件达成共识后,要求避难的东德公民乘专列穿越东德领土来到西德,成为柏林墙倒塌前进入西德的首批东德公民。面对百姓旅行自由的要求,1989年11月9日前东德政府推出了“迁居自由和旅行自由法”,但此法被情绪化的东德百姓误解为“边境开放法”,当晚人们便打通了柏林墙,东德百姓纷纷涌

入西柏林。面对这一突发事件,西柏林市政府采取了推波助澜的措施,向每个过境的东德公民发放100马克的“欢迎钱”(Begrüßungsgeld)。柏林墙打通后,东德其它边界也随之开放,大批东德公民由此进入西德边境城市,同西柏林市政府一样,其它西德城市也向每个东德公民发放100马克的“欢迎钱”,许多年轻人从此留在西德。

柏林墙打通和东德边界开放为德国统一带来了契机,前联邦总理科尔凭借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敏锐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抓住这一历史性机会,促成德国统一。在获悉柏林墙打通这一突发事件后,科尔中断了对波兰的访问,赶到西柏林处理国事,并于1989年11月28日宣布了“十点纲领”,试图以“邦联国家”(“Konföderation”)形式实现德国统一。1990年1月在莱比锡等东德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和平游行,东德百姓强烈要求德国统一,“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变成“德国,统一的祖国。”除政治和文化因素外,人们渴望统一还有经济因素,人们渴望早日得到西马克,呼吁西马克早日来到东部地区,“若马克到我们这里,我们留在这里,若马克不到我们这里,我们到马克那儿。”迫于大批东德公民对西部地区的潜在的移民压力,在短时间内两德政府决定将西马克输入东部地区,并在1990年5月18日签署了“建立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国家条约”^①,条约要求西马克代替东马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社会联盟。按此“国家条约”,7月1日起西马克进入东部地区,在很短时间内,东马克由此消失,东西德实现了货币统一。货币的统一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而1990年8月31日两德签署的“实现国家统一”第二个国家条约,在政治上为政治统一奠定了法律基础。在美英法苏原占领国最终同意德国统一后,1990年10月3日民主德国按照联邦德国“基本法”第23条,加入了联邦德国,这一统一形式因其不对称性和不平等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并吞”的特点。

4、美英法苏对德统一的立场和“4+2条约”

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美英法苏原占领国持有不

^① Staatsvertrag zur Währungs-, Wirtschaftsund Sozialunion. München 1990.

同的立场和态度,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反对德国统一;法国提出有条件支持德国国家统一,要求德国放弃马克,接受欧元,加快欧盟统一进程,使统一后的德国融入欧洲,以此限制德国的强大。同英法不同,美国则支持德国统一,其前提是统一后的德国须承认德波边界现状——奥得-尼斯河边界,继续留在北约^①;而前苏联要求统一后的德国退出北约,成为中立国家。面对美苏在德国统一问题上的对立立场,科尔凭着对德国统一历史机遇的责任性,加紧外交谈判,1990年7月在莫斯科和高加索同前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在统一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其先决条件是,德国须放弃使用核武器和生化武器,将联邦国防军减至37万,在前苏联在德国东部地区驻军期间,北约不得将其势力范围扩大至德国东部地区,另外同意在1994年年底以前从德国东部地区全部撤出苏军。

为最终解决德国问题,1990年9月12日美英法苏外长和两德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4+2条约”(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条约同意结束由波茨坦协定确定的占领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放弃对德国统一的最终决定权和对柏林的最高权力。随着“4+2条约”批准和生效,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政治上完整独立的主权国家。

1990年10月3日德国实现统一后,在规定的撤军期限内,四国先后完成了从德国的撤军,最后一批苏军也在1994年8月底撤回国内。德国支付了数百亿马克用于从东德撤回的苏军在国内的安家费。四国占领军的完全撤走,二战后的占领现状也随之结束,德国完成了主权统一。

二、由主权统一到内部统一

在完成主权统一前,联邦德国政府已关注德国内部统一,制定和推出相应的政策,实现东西德地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促进德国由主权统一到内部统一的进程。

1、经济一体化进程及措施

为在东部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经济一体化,联邦政府根据统一前签署的“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国家条约”,在德国统一后不到四年内建

立了货币联盟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经济联盟,完成了东部经济转轨和私有化改造,并通过经济促进政策和措施加快东部建设和东部地区经济发展。

· 建立货币联盟

按照“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国家条约”,两德于1990年7月1日实现了以西马克为主的货币统一。在兑换比例方面,两德政府最终达成以下妥协,“工资、薪水、奖学金、养老金、房租、租赁金以及其它循环支付项目以1:1比例兑换”,“其它东马克款项和债务以2:1比例兑换”,另外,根据不同年龄对东德公民存款给予1:1比例的限额兑换:14岁以下为2000马克,15岁到59岁为4000马克,60岁以上为6000马克,剩余以2:1比例兑换。1990年7月1日起西马克取代了东马克,这一新货币冲击了东德境内原有的商品价格体系,使之受到市场调整。在东马克消失后,原东德经济失去了货币金融基础,东部地区也被迫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②

· 完成国企私有化

如果说货币统一为在德国东部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货币机制,那么在统一后前四年由联邦托管局完成的原东德国企私有化改造使东部地区实现了经济制度的转轨,在这方面采用的措施有:直接私有化、重新私有化、先整治后私有化以及停业清理、理顺企业机制。

直接和重新私有化:其对象是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国企,对之采用直接出让或退还原主方式,这里负责私有化的联邦托管局没有将买主仅限于德国境内,也面向境外,力争在世界范围内为东部国企私有化改造开放市场,加快国企私有化国际进程,境外投资方主要来自欧盟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荷兰)、美国和加拿大等。

先整治后私有化:对不能直接私有化、但有整治能力的东德国企采用先整治后私有化改造方式,这

^① Vgl. Ralf Beste u. a.: *Die Herren der Welt*. In: *Der Spiegel* 17 / 2003, S. 18 - 29, hier S. 23.

^② Gesetz zur Beseitigung von Hemmnissen bei der Privatisierung von Unternehmen und zur Förderung von Investitionen vom 22. März 1991. *Bundesgesetzblatt*, Jahrgang 1991, Teil I, Nr. 20-Tag der Ausgabe; Bonn, den 28. März 1991.

方面联邦托管局给予的资助有:托管原企业债务,提高企业资本,提供整治补贴。对消耗大、效益小、污染重、长期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的国企进行拆散、肢解和分离,使具有市场生存能力的国企部分实现私有化。

停业清理,理顺企业机制:对无市场生存能力,不能整治,严重亏损的国企进行“停业清理”,对企业中有竞争能力的部分进行分离,实现局部私有化。

通过私有化改造,东部国企私有化程度达到近95%,其中全部私有化企业达到6089家,占托管企业的49.4%,直接转让企业达844家,重新私有化企业为1581家,占托管企业的13%,有近73家企业实现部分私有化,未完成私有化改造企业有649家,占托管企业的5.3%,^①联邦托管局对原东德国企近四年的私有化改造,虽然在短时间内为东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了相应的企业机制,但快速私有化也致使大批东德百姓失去工作岗位,影响德国的内部统一进程。

· 促进东部经济政策

为实现经济一体化,联邦政府推出的东部经济促进政策和措施有“团结公约”(统一附加税)和财政平衡,欧盟也向德国东部地区提供地区促进资助。

“团结公约”:为克服东西德地区间存在的经济不平衡,缩小地区生产和消费上的差距,在两德统一后,联邦政府于1995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为十年的“团结公约”,除要求各州、经济界关注东部建设、承担义务外,“团结公约”规定德国百姓交纳幅度为工资税5.5%的“统一附加税”,每年联邦政府向新联邦州给予财政转让,迄今为止以每年1300亿马克(约650亿欧元)计算,联邦政府为东部地区提供的直接财政资助已达1.3万亿(约6500亿欧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在“团结公约I”第一阶段基础上,现届联邦政府同各州达成了第二阶段“团结公约II”,有效期为15年。按此公约,联邦政府将继续向新联邦州提供财政转让,自2005年起15年内向新联邦州提供总额为3060亿马克/1565亿欧元的财政转让,自2009年起在幅度上将逐渐减少,最终让新联邦州依靠自身财力,摆脱联邦政府的财政援助。

财政平衡:如果说,在“团结公约”框架下征收的

“统一附加税”和财政转让是联邦政府旨在促进东部建设推出的政策和措施,那么,财政平衡则是在“基本法”宪法框架下进行对东部资助,其目的是依靠国家政策和财政政策杠杆,调节和平衡各州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缩小因不同的经济发展前提和地区特殊性所致的地区差别。这里财政平衡有纵向平衡和横向平衡两种,前者指联邦政府对州、地方政府或州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后者则指富裕州向“贫困州”的同级财政转让。根据有关横向平衡的宪法要求,德国富裕州有向“贫困州”转让超标财政的义务,如多年来黑森州、巴-符州、巴伐利亚州、北-威州和汉堡为五大“富裕州”,它们每年转让的财政平衡款项近达82亿欧元,其中86%被注入东部地区。此外,联邦政府每年给予东部地区的纵向财政平衡款项多达数十亿欧元。

2、政治社会一体化

在完成主权统一后,联邦政府通过政治法律一体化措施和“非民德化”进程,促进东西德地区的政治社会一体化。

· 法律制度一体化

这里,在两德统一进程中签署的“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国家条约”和“关于实现国家统一的条约”构成统一后德国法律政治一体化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联邦政府在统一后的很短时间内,将西部地区的基本法、法律制度、政府机构机制扩大至东部地区,以此取代原民德的宪法、法律制度和政府机构。这种制度文化强行推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让东德百姓失去国家政治认同,在心理上难以接受和适从新的社会制度和制度文化,并有“二等公民”的自卑感。^②

· 非民德化进程

为消除原民德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在实现经济政治法律一体化过程中,联邦政府对原民德进行了“非民德化”运动,这里主要涉及上层建筑部门如高等学校和政府部门。受到清洗的对象主要有原民

^① Jan Prieue: *Die Folgen der schnellen Privatisierung der Treuhandanstalt. Eine vorläufige Schlußbilanz.* In: Das Parlament B 43 - 44, 1994, S. 21 - 30, hier S. 23.

^② Vgl. Alexander Thumfart: *Politische Kultur in Ostdeutschland.* In: Das Parlament B 39 - 40, 2001, S. 6 - 14.

德的党政官员、公职人员和高校教师。一些受意识形态影响较大的大学专业如法律、经济、历史、哲学、教育和社会学等专业和学科相继被关闭或重组。为确保大学这一上层建筑领域不再受到原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大学有近70%在职岗位被换新人,许多重要学科也由西部地区教授担任,东部地区教授被迫失业;受到“非民德化”运动清洗的还有原民德驻外使节和工作人员,国家安全局人员。这种彻底的清洗方式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在形式上消除了原民德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但由此造成的大批人员失业和辞退也给社会带来不稳定的因素。^①

3、德国内部统一面临的困境

自1998年本届联邦政府执政以来,东部经济建设被确定为德国重中之重的任务。人们致力于内部统一的实现和东西部同等生活条件的建立^②,并把最终完成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内部统一看作是本届联邦政府制订东部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这一问题的解决不仅受制于国内因素,而且也受制于外部因素。

经济全球化所致的外部竞争也成为东部经济缓慢的因素之一。由于德国税收过高,致使本国资本流入低税国家和地区,而没有如同联邦政府所期望的那样,流入德国东部地区。德国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抑制经济的发展;高福利又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③这种情况虽然已引起联邦政府的关注,并通过实施相应的减税方案,降低行商税、公司所得税和工资附加税,使德国的高税收情况有一定的改变,但要达到一般低税收国家的水平还有一段距离。另外,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涌入德国东部市场,使东部经济面临更加激烈的挑战。特别是2004年5月欧盟东扩后,德国东部企业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目前德国所实施的各种改革如政治、经济和社会各层面的改革旨在应对经济全球化对德国经济和社会模式及内部统一的挑战。经济全球化对主权国家的冲击必然影响主权国家对本国公民利益的保护。统一后的德国对本国公民的保护虽具有合法性,但在经济全球化冲破国界时,这种合法性受到了挑战。鉴于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德国试图一方面深化内部统一,另一方面通过改革更好地对产品、资本和劳动力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经济主权的局限性。

结束语

从内政角度来看,在过去14年中,德国东部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基础设施得到飞速的发展,东西德百姓的生活水平也不断接近,但在柏林墙倒塌14年后仍有三分之二的东部德国百姓认为统一的德国问题仍未得到解决,东西德百姓之间还存在着“心理墙”。另外,东部德国高达18.6%的失业率影响社会稳定,助长了排外和极右思潮和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情绪。因此,要使东西德地区真正实现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完成德国内部统一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这将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从国际政治角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末东欧巨变给德国用和平方式完成主权统一提供了历史性机遇。统一虽然给联邦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担,但统一使德国避免因分裂面临潜在战争危险。在这一前提下,尽管统一给德国百姓带来额外经济负担,缴纳“统一附加税”,但这一历史事件仍受到德国社会各界的认可。随着40多年的冷战和东西方对峙的结束,德国统一对欧洲安全和世界安全与和平也做出了贡献。

责任编辑:肖友瑟

^① Vgl. Harry Schröder u. a.: *Psychosoziale Gesundheitsrisiken im Transformationsprozeß*. In: Hubert Sydow u. a. (Hg.): *Chancen und Risiken im Lebenslauf; Wandel in Deutschland*. Berlin 1995, S. 255 - 271.

^② Vgl. *Der Koalitionsvertrag zwischen der SPD und Bündnis /die Grünen*. In: Dokumentation von Parlament Nr. 42/43 vom 21/28. Oktober 2002. Hier insbesondere Kap. III. Aufbau Ost.

^③ Vgl. Michael Sauge u. a.: *Lastesal der Nation-Warum es sich nicht immer weniger lohnt, zu arbeiten*. In: *Der Spiegel* 39/2003, vom 22. 9. 2003, S. 98 - 112.

DEUTSCHE INHALTSANGABE

Das von Erschütterung und rascher Veränderung geprägte Rheinbild —Protokoll über die deutsche Politik,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des Jahres 2003

Guo Xiaosha

Die Reform hat teilweise Erfolge erzielt, wobei die Reformbelastbarkeit in der Gesellschaft und bei dem Volk erhöht wurde. Das Äußerungsverbot bei sensiblen Fragen führt zur Reflexion über die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ie Regierungs- und Oppositionsparteien beschäftigen sich damit, Politiken zu adjustieren, den inneren Gegensatz abzubauen und Kräfte zu sammeln, um das bevorstehende Jahr der Reformen und Superwahljahr zu begrüßen.

Deutschland: von der Souveränitätseinheit zur inneren Einheit

Wang Zhiqiang/Dai Qixiu

Im Oktober 1990 hat die Souveränitätseinschränkung Deutschlands durch die Besatzungsmächte ein Ende gefunden. Deutschland hat die Souveränitätseinheit verwirklicht. Seit den letzten 14 Jahren befasst sich die Bundesregierung mit der inneren Einheit und der Integration des politischen, rechtlichen, wirtschaftlichen und sozialen Systems. Die innere Einheit Deutschlands ist zwar eine innenpolitische Frage, wird doch auch durch den äußeren Faktor, nämlich wirtschaftliche Globalisierung, bedingt. Der Impuls der wirtschaftlichen Globalisierung wirkt konsequent auf den Interessenschutz der souveränen Staaten für ihre Bürger. Der Reformprozess in Deutschland zeigt die Begrenztheit der wirtschaftlichen Souveränität von Nationalstaaten vor dem Hintergrund der Produkt-, Kapital- und Arbeitskraftglobalisierung.

Das Zusammenleben oder der Kampf der Kulturen—die Begegnung der Weltanschauungen von Harald Müller und Samuel Huntington

Gong Yan/Song Jianfei

Die Thesen des US-amerikanischen Politologen Samuel Huntington mit dem Schlüsselbegriff „Kampf der Kulturen“ haben in den letzten Jahren großes Aufsehen erregt. Einer seiner qualifiziertesten Kritiker meldet sich nun zu Wort: Dr. Harald Müller von der Hessischen Stiftung für Friedens- und Konfliktforschung in Frankfurt legt seinen an-